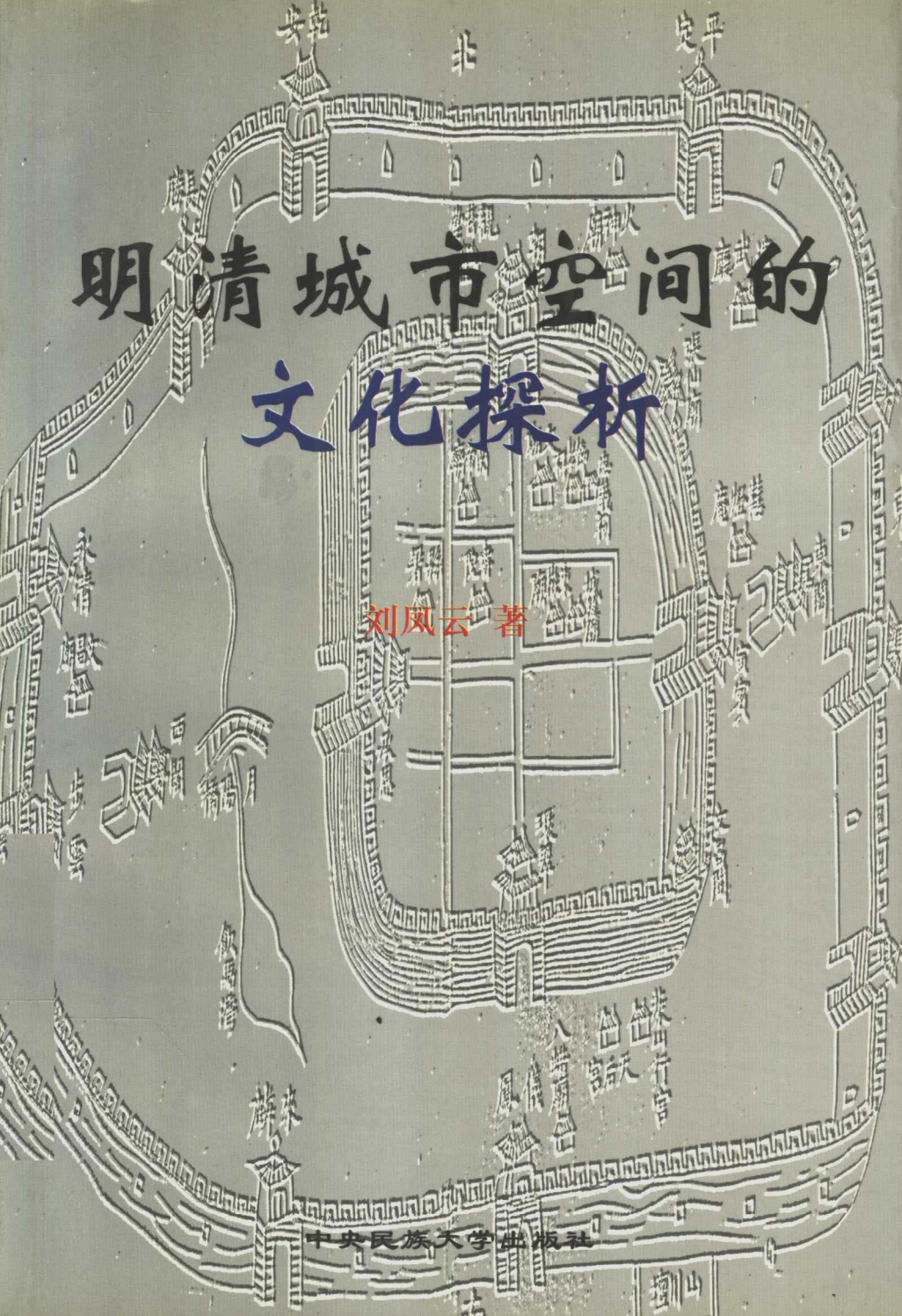




明清城市空间的 文化探析

刘风云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

刘凤云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刘凤云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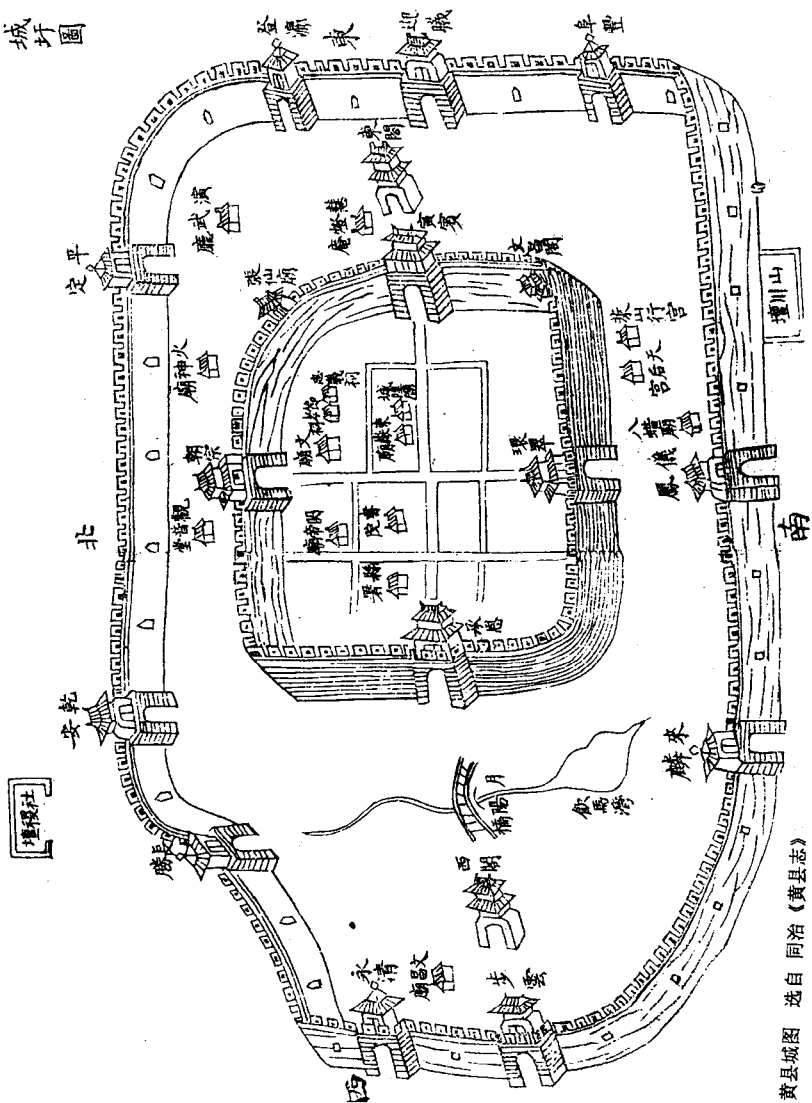
ISBN7-81056-530.3

I. 明… II. 刘… III. 城市建设—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TU9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9155号

书 名	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		
著 者	刘凤云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6847281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530-3/TU·1		
定 价	18.00 元		

城圩圖



黄县城图选自同治《黄县志》

汾陽縣城圖 选自乾隆《汾阳县志》

汾阳县城图 选自乾隆《汾阳县志》

序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作为人们生存居住的空间，大体可以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种形式。城市曾为近代西方社会的重心，在那里孕育了近代文明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主，早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然而，在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中，城市同样积淀起厚重的历史文化，是一有待于充分发掘的文明宝库。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步伐，人们对于在人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城市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视，城市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学问，不仅是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研究涉足的对象，而且尤其需要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不仅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城市的兴起几乎与古代文明的发端同步，可以追溯到商代、甚至夏代。同时，对城市史的研究，还在于城市的自身发展需要历史的借鉴，人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城市同样需要人们了解它的发展历程。有鉴于此，《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一书的出版，应当说是恰逢其时。

这本书选择了“明清”和“城市”为时空两大坐标，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两个朝代、上下近六百年的历史，从城市空间的分布与结构，包括城市空间的建筑组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研究的内容有城墙池濠、坊巷社区、官衙、民居、市廛、寺观、茶馆、会馆、园林等等。而这些领域的以往的研究，传统史学仅限于方志的记载和描述，现代史学只注重城市历史的沿革，均未

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而本书的写作带有一定的前沿性，从而也构成本书在研究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特点。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独特的文化视角来研究城市空间中经过历史沉积的物化文明，它有别于以往从经济史、社会史入手的研究，也不同于就问题进行点状式、区域式的研究。而是选择剖析城市空间中的物质内容，即对建筑组合与分布状态中的人文因素与文化内涵进行研究。这不仅是一项史学研究中的新成果，也有助于我们通过城市这一社会的窗口了解中华文明中的历史文化。

对明清城市空间进行文化的研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课题。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广博，而城市又千姿百态，性质类型各异。这些问题的研究所依据的资料既非常零散，又缺乏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从资料到观点几乎都要从最基础的作起。作者积数年之力，从浩繁的笔记、方志、诗歌、小说中铢积寸累，提炼出有关城市空间的文化内容与思想。本书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博学而约之。可从中窥见作者创见性的理论思索，是一部用力勤苦，思想开阔的学术著作。

王思治

2001年4月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城墙	9
一. 城墙与“城之役”	9
二. “城”与“池”的价值体现	21
三. 城墙的样态与城门	32
四. 城郭与城市的扩展	38
第二章 坊巷与社区	44
一. 行政社区坊的演变	44
二. 人文社区的形成	54
三. 街制与街巷	63
四. 街道的修葺与治理	70
五. 街巷中人文文化的投影	76
第三章 官衙与民居	85
一. 城市中的官衙	85
1. 官衙方位与“治中”	85
2. “无壮丽无以重威”	89
3. “前堂后寝”之制	91
4. “重门复道”与“左祖右社”	97
5. 戒石与钟鼓	99
6. 堪輿之说对官衙的影响	102
二. 城市住宅	105
1. 城市住宅的风貌与屋宇之制	105

2. 四合院及家居中的“礼教”	111
3. “大治宅第”及其时尚	117
4. 上层社会的居家风格	123
5. 士大夫的居家理念	127
三. 满族房屋建筑中的火炕	130
1. 适应于自然的取暖方式	131
2. 满族的取暖特色	136
3. 取暖方式对建筑的影响以及火炕与时人的生活	140
4. 火炕中的“礼”	144
第四章 市廛与寺观	147
一. 市廛对城市空间的占有	147
1. 市廛早期的演变与街市的形成	147
2. 市廛的繁荣及其类型	155
3. 商业文化的积累与市廛的发展	161
二. 寺观与城市生活	165
1. 寺观庙宇及其在城市中的位置	166
2. “神道设教”与信仰的多元化	168
3. 寺观祠庙建筑的同一化	174
三. 市廛与寺观在空间上的重合	178
1. 庙市的丰富多彩	178
2. 庙市的开放性	182
3. 庙会的社会性	188
第五章 剧院、茶馆与会馆	191
一. 诞生于市廛中的演艺场所	191
二. 茶馆及其社会化的空间	197
三. 茶馆与市井文化的传播	205
四. 茶馆衍变与茶园的诞生	209
五. 会馆及其对士商文化的兼容	215

第六章 私家园林	226
一. 城市私家园林的发展	226
二. 文化时尚与士大夫对园林的“痴迷”	238
三. 归田与园林的人格化	245
四. 园林中的“士文化”	255
五. 园林所表现出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264
六. 文人官僚与城市私家园林之兴衰.....	270
附主要参考书目	279
后记	288

导 言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是伴随着新的价值、新的制度而产生，它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孕育文明、创造文明的社会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 城市的发展未离开社会演进的步伐，而人们对城市的关注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对于城市研究这一领域，无论是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建筑学和历史学都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并构建起各种不同的理论概念。本书无意去建筑理论体系，但却认为，在众多的有关城市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了“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却忽视了“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研究。而事实上，城市中的建筑物是一个城市的最基本构成，它是城市的标志。而这些城市构成与标志，都是由城居者所建，其中蕴含者城居者的思想理念，价值判断，时尚追求，审美情趣等等，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它代表的是凝聚的物化文明，是一个时代人文文化的集中表现。因此，它应该是城市研究的基础内容之一，也是本书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不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也不是对明清城市的全面论述。中国历史悠久，而城市文明的历史同样悠久，由于历史赋予了城市各种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时代又给予城市以不同的影响，所以城市面貌万千而性质各异。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56页。

社会的发展已经步入变革的前夕，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城市，其发展状况尤其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的某些特征。诸如，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手工业市镇，运河沿岸的工商业城市以及港埠城市发展迅速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属于中国“乡村城市化”的一种类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然而，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众多的古代城市中，构成明清时期城市发展主流的，仍是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传统城市。所以传统城市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此，准备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中国传统城市的政治属性及其特征

就西方国家而言，城市的政治制度是自希腊城邦时产生的，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则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公社，这类城市培育了市民社会，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摇篮。而在古代中国，城市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产生的，许多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也是在城市中得到精心策划的，并在城市中演出了其最精彩的场面，其经济的功能是附属于政治的。正如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所说：“亚洲城市的兴旺或说得更好些，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联带关系。”这一论点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政治属性。

古代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虽然社会转型的诸因素已开始了躁动，而城市的发展依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运行的轨道，不但作为封建政治、经济中心的消费性城市的性质没有改变，即延续了二三千年的古老的城市形态也依旧，这就是城墙式的城市。城墙城市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也融入了反映其时代的政治

内涵。可以说，自秦朝废分封置郡县，建立起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体，城墙城市便与封建专制政治形成无可分割的一体。在一定意义上，城墙城市也即为官僚制城市。

通常而论，文明形态在上层建筑最集中的反映是政治权力的构成。换言之，城市的性质与政治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西欧中世纪相对分散的政治权力，产生了代表市民社会、相对自由的工商业城市。日本的封建政治，介于中国和西欧之间，比中国的权力分散，但又比西欧的权力集中，因而日本产生了有别于西方和中国的幕藩制城市体系，而中国的皇权至上的政治，也就必然产生出官僚等级制城市。其表现形式：

首先，中国城市体系呈现出集权制官僚等级序列的金字塔形态，即城市是按照官僚等级的序次排列为京城、省城、府城、州城和县城五个级别，其下才是带有工商业集散地性质的市镇。京城作为中央城市，是皇帝和京朝官员的所在地。省城、府城、州城和县城作为地方城市，分别为督抚藩臬、知府、知州、知县的所在地。京城只有一个，立于金字塔的顶端，省城在明代十三个，入清以后逐渐增至二十余个，府城为一百九十余个（不包括作为省城的首府），州城约三百四十七个（包括厅），县城约一千三百五十三个。城市数量在等级上的分配也完全符合金字塔形态的要求。

其次，城市的管理系统也处处表现出官僚政治的特征，即官本位的一元化统治。金字塔般的封建官僚系统与城市网落是完全一致的，自省城、府城、州城以及县城，均由封建国家委派官僚进行管理，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城市里，只有知府有权决定城里的一切事务，在省里，只有总督和巡抚有权决定省里的一切事务。”^① 官僚是城市中的全权统治者与

^①「法」白晋著 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见《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管理者，而在官僚对城市的绝对统治中，不存在商人以市民身分参政的权力。

此外，明清时期的城市管理还表现在自上而下的有效统治与权力交错的网络状态，这是专制国家集权政治在城市管理上的又一表现方式，即所谓“知府掌一府之政，统辖属县。”^① 通常，大府可领州县十五、六个，大省领府十四、五个，领州县一百余个。^② 上级官僚不仅可以通过隶属关系过问下属官僚所管辖的城市，且因衙门同城而置可直接参预所在城市的行政，并行使有效的权力。其时，这种两个衙门以上并置一城的现象并非个别，各省的首府（即省城）大都属于这种情况。如广东的广州，既为省城，又是府治，同时还是南海、番禺二附郭县的县衙。福建的福州情况与广州相同，除了作为省城、首府之外，也有闽县侯县而附郭县的衙署。另外，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即浙江嘉兴府的府县城设置。有记载曰：“浙江嘉兴府属嘉兴、秀水、嘉善三县，明宣德以前本属一县，后以县境辽阔，分置三县。画府城中地，尽隶秀水，嘉兴名为首邑，城中转无片壤，地方官不啻侨寓邻县治事。明万历时虽有创意，以府城前河为两县分界者，终未果行。”^③ 表明嘉兴府城与嘉兴县城在地域空间上始终为一体，在分县之后，又多出一个秀水县，同一块空间归属三个衙门管理。

这说明，机构的重叠是传统城市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这种现象缘于城市系统的重叠，从而又造成了城市空间行政区域的重叠。然而，这种管理格局却完全符合分割地方权力、集权于中央的专制政治的准则。由此可见，以“大一统”为主干的古代中国文明也是中国封建城市文化的主要内涵。

^① 《历代职官年表》卷 53。

^②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统计。

^③ 刘鼐木：《苕楚斋续笔》卷 9，嘉兴县志。

二、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

中国的传统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空间模式。所谓空间模式，实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表示的是城市在地域分布上所形成的带有一定规范性的格局。在古代中国，它是由城墙、城池圈筑起城市的周边，其形态以矩形最为普遍，城墙四边有门、门上有城楼；城内棋盘式的街道纵横交错；由官衙、贡院、书院等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建筑；庭院式的民居坐落于大街小巷；遍布主要街道的是为满足城市消费需求而设置的市廛，以及自然发展起来的街市；官衙或街市都有钟鼓楼设置；街头与市廛中都夹杂着诸多休闲娱乐场所，如茶馆、茶园、戏园等。此外还有以孔庙、佛寺、道观为主体的众多祠庙寺观群和带有山野情趣的园林建筑。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城市的空间模式。而高大的城墙，宽阔的街道，低矮的庭院式平房，更是其有别于西方的典型“中国式”。这种模式已为城市建造者、也即国家的统治者们所遵循。

正所谓：“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必使参相得焉。故城池民所依也，公署民所受治也，坊表示民以观法也，街市便民之日用也，有师之尊，而学校之奠阙攸居。而村社分徒杠輿梁便往来以济不通，制邑之规模备矣。”^①

如前所述，城市空间结构的状态及其已经程序化了的模式，是一种物化的文明，其中蕴含着由历史沉积而成的深厚的文化。文化的内涵广博，而传统城市的文化除了广博之外，更给人以厚重之感。因而，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视野广阔，且尤其要进行深

^① 乾隆：《青城县志》卷2。

层次的文化挖掘。对此，本书将作一些尝试，从六个部分就城市空间文化的特点略作说明。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城墙是我国传统城市的重要标志。传统城市虽在城乡之间实行行政上的一体化管理，而在地域上却因城墙的分割而界限分明。墙内为城市，墙外为关厢、为乡里，区别是鲜明的。本书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将传统城市称之为“城墙城市”。

在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明清时期是大修城池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现象说明了城墙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及其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与发掘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以及“金城汤池”，“城池之时义大矣”的文化观念已深入人心。而由城到郭，即从内城墙到外城墙，它反映了中国城墙城市的空间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扩展是从城到郭逐步完成的。

第二，由坊、街、巷组合而成的城市地域空间，在明清时期仍保持着其古老的样态，但曾经对城居者居住环境与范围进行限定的坊制已不复存在，坊仅仅是城市社区单位的名称而已，并在逐渐地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城居者于若干个坊的基础上又自然形成了不同等级与层次的人文社区，每个人文社区都有着使其得以凝聚的共同的文化和。

此外，街巷的风貌虽然依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时代的风格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街巷的内里空间则反映出带有社区差异的文化特征。由街巷的名称，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城市的某些特征，更可从中了解历史的厚重。

第三，在被赋予政治属性的传统城市中，官衙可谓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而在官衙庞大的建筑群体中，尤以前堂后寝的构造最具特点，从文化渊源上看，它是古代礼法观念与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古者室以宫矩”，《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城市模式，但在官衙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的明显作用是将官衙与家居合为一体，而这正是我国古代家天下的帝王体制和传承制度的产物，是“王者营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延续。明清时期，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但王朝的延续，演义的仍是家天下的历史，所以帝王体制的不变，决定了服务于政治的官衙体制的不变。

第四，市廛与寺观，一为满足人们生活之需的商业区，一为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宗教区，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然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共场所却出现了在空间上的相互渗透与交错重合，它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城市特有的经济与文化现象。

在明清两代，尽管城市商业进入了迅速增长的时期，但封建专制政治与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有限的空间，而商品经济所促发的商业运转及其内在的推动力却又无法制止这种需求。于是，城市商业在盲目而又自发的碰撞中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就是寺观。由于寺观已成为特定的公共集会场所，且又有以时举行的约定成俗的宗教祭祀活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赶庙”。于是，这种非官非民却又凝聚人气的地方，便成了商业渗透的空间场所，庙会具备了宗教与商业的双重性质，庙会也因此被称作“庙市”。庙市的独特以及宗教自身的包容，为传统的城市商业赋予了独特的运作空间与运作方式，这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

第五，茶馆、茶园以及戏园等，皆以消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形式立于明清时期的城市中。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已经成为传统中国城市的象征性建筑。但它们却并非为传统文化所倡导，而是形成于城市的自然发展过程，即城市生活的客观需求，使茶馆、茶园等在社会中分别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从它们的出现到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化的市民生活及其文化的自身发展状况。

早期的演艺场所“勾栏”诞生于市廛中，是市井文化传播